

上 编

总 论

第一章

古典史学的终结与新史学

第一节 拉开‘史界革命’的序幕

近代特别是近百年的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上一个世纪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经过了千辛万苦的斗争，努力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爱国主义史学思潮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主潮。近代史学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要求。

到了上一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形势下，加上外国新学理不断传入中国，中国史学发生了新的变化。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人打起了史学革命大旗，提出了“新史学”的口号。

应该说，中国传统史学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已经发生了变化。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边疆史地研究出现高潮，标志着中国史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潮。传统史学一方面在沿着旧的途径向前迈着沉重的步子，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自己的固有形态，以适应时代的需要，适应民族的需要。史学家从经学里寻找思想武器，公羊三世说与《周易》的通变思想成了历史变革观的思想资料。魏源以公羊学建立起他的气运说，论说历史变易是一种必然。从王弼、

郑观应到康有为、黄遵宪，这些思想家提出各种理论，实际上是希望更新传统史学以适应时代的需要。百年历史借鉴思想发展的轨迹是：从借鉴近代亚洲、非洲国家亡国灭种的教训，寻找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经验，到借鉴制度层面的内容，企图按照君主立宪的办法来改变社稷的命运，进而输入、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内容以寻找真理。

中国的思想家、史学家希望从俄国的彼得大帝改制、日本的明治维新的经验中吸取经验，救亡图存，使自己的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戊戌变法失败、辛丑和约签订，中国陷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渊，也表明旧史学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必须来一番更大的改造。同时，时代变动、西方的学理输入，也为学术变化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张起了小说革命、史界革命的大旗。并且把这种文化上的“革命”作为救国的头等大事。1900年，章太炎提出要写一部与中国旧史不同的中国通史。梁启超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章太炎起而论新史学，写信给梁氏谈论新史学问题，声称自己要写新的通史，“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②另外有邓实在他写的《史学通论》一文中说：“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 无史则无国矣。”

在史界革命的呼声中，我们应当看到他们内中思想既相同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39页。

《政艺通报》第12期，1902年8月18日。

又不尽一致。相同处是他们对旧史学的批判，是对中国旧史学一次大的冲击；不同的是他们思想差异带来的主张上的区别。

就其相同处说，可以归结为以下诸端：

提倡民史，反对君史；

提倡进化论，反对历史循环论、历史倒退论；

提倡新体裁，反对旧体裁，摒弃了旧史学的所谓的史法、史例；

提倡社会文化史，反对单一的政治史的史学格局；

提倡用明白易懂的语体撰写史书。

1902年，梁启超写《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梁启超是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新史学》是他为进行史界革命而写的檄文。他从理论上指出史界革命的必要性，论说了史界革命的方向与内涵，这就是他的新史学的理论。他认为古代史学弊病的病源有四端，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以上四弊而又生出二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这样的六弊又给读者带来恶果是：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在总结出旧史学的弊与病以后，他说：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这里，我们看出梁氏鼓吹的史界革命的实质，它带有反封建性

的文化思潮的性质，带有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特征。但是把史界革命放在救国头等大事的位置上，说“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这不仅是有点言过其实，也反映出这种史界革命又有改良主义性质的一面。

新史学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要求历史观点更新，提出历史进化论学说。《新史学》一文阐述他的历史进化论基本观点：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例公理者也。这是梁启超在史学理论探索上最有生气的方面。第一点，是把历史与自然放在一起考察，认为历史社会与自然运动虽不同，但社会与自然都是在进化之中。社会进化更明显体现在人群的活动方面，但这种进化不是直线式的，“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第二点，在承认历史进化的思想基础上，又指出历史中有公理公例存在，进而指出历史客体与主体的区别与联系，说明由此出现历史哲学。这里引出梁氏的言论，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火花。他说：

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佛典译语，常用为名词。）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而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

关于历史哲学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梁启超作出明确地说明，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历史哲学的重要任务在求得历史的公理与公例，而要求得历史的公理与公例、求得人群进化之真相，如梁启超所说，在于要有一个整体历史的观念，其方法是：“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其次是把历史学与其它学科联系起来。这为近代历史哲学的研究指明了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着重批判了孟子的历史循环论、三统历史观的历史循环论，而且把公羊学三世说与历史进化论联系起来，并作了解释，说：“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

第三点，强调要把历史哲学与史学功能问题联系起来。梁启超说：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中国前此之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吾愿与同胞国民筚路蓝缕以辟此途也。

梁启超不只是泛泛地谈论近代史学对增进文明的意义，而且从整个世界历史的变动上，讨论历史学的价值，“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

梁启超从史学理论上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同时，对旧史学的正统论作出了严正的批判。过去的史学上正统论产生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历史上君王为维护统治，制造出这种自私的理论，二是陋儒的曲解历史造成的恶果。由此，可以明了中国传统史学历史编纂学上的“书法”。所谓的春秋笔法、褒贬中的史例以及系年纪事中的大经大法，也是相当的荒谬。梁启超指出，“一言以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但是，史学不是不要褒贬，褒贬的原则当是“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而必不可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

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高扬史界革命大旗，从根本上批判了封建史学，划清与旧史学的界限；从历史理论、历史编纂学、史学性质、史学功用上，全面系统地界定了近代史学所具有的特征。所以，这篇文献标志了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标志中国史学开始走上近代化的历程。

也要指出，20世纪的新史学运动中的史学革命，有其缺点，总的说来，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史界革命对传统史学的全面批判，揭示旧史学的“四弊”与“二病”，又从历史观以及关于正统、书法等一系列史学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作出了尖锐的批判。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梁氏的批判又有简单化的一面。在批判中国旧史学的同时，没有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作出科学的分析。完全的否定，不是辩证的分析，用这种办法建构新史学难以收到预期的成效。

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史家吸收外来的理论但没有经过自己的消化，没有融化成为带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史学理论，同

时在一些根本理论上，没有深入思考，有的地方前后矛盾。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论，但自然与社会的公理公例有怎样的区别与联系？梁氏前后提法不一致。他意识到社会与动植物界乃至无机界都是在进化，但又以为，“就自然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一成不变，万古不易，故其体为完全，其象如一圆圈。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在回答自然与社会是否都是进化问题上，梁启超并没有明确的认识。梁启超引用优胜劣败的达尔文学说，用意在于论说中国民族要自强，但这种生物进化论直接用在社会历史上，是不准确的。对世界的大势的分析也存在缺点。后来梁氏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这在他的前期理论上，已经露出了端倪。梁氏的思想在多变之中。他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但是，我们要注意他在这种否定中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是在否定中向前进，还是在否定中向后退，这正是我们后面要讨论的问题。^①

20 世纪初年的史界革命作为新文化的先声，是新文化运动中强音，显示其独有风貌。但是这种“革命”带上改良的色彩，又有其自身的弱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梁启超政治立场多变，这些都反映到他的史学观点的变化。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梁氏到欧洲游历后，欧洲革命的风暴对他产生巨大压力，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到了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好像是航行在大海上失去了罗盘的一只海船，不知如何是好。到了 20 年代，梁氏的史学思想倒退表现得是那样明显，具有代表性。曾几何时，20 世纪初年史界革命中不少勇士，到了 20 年

文中引《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代，不再坚持自己当年的主张，以至否定自己的观点。有的人在困惑中在向佛学靠拢。

新史学潮流中出现了新的史著，夏曾佑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名的新式的通史”^①——《中国历史教科书》。夏氏把中国的今文经学与西方历史进化因果论结合起来，构成他的历史进化世运说，把中国历史分成三大时期，每一个时期，又分成若干阶段。这部书反映出从传统史学向着近代史学转化过程所带有的特点。1933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更名为《中国古代史》。除此以外，还有些新的及不新不旧的通史。这是转型时期史学的特色。

第二节 古典史学的命运

1940年，张荫麟追溯近代史学的变化，说：“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交关头，正如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挖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来年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来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沉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②从现象上看，司马迁、司马光史学是过去了，但古典史学难道真的就

^①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的发展》，载《燕京社会学报》，1949年10月第2卷。

^② 《中国上古史纲·自序》，见《中国上古史纲》，台北里仁书局，1995年第6版。

是消失了吗？果真如此，那我们的民族史学的生命力在哪里呢？创新史学，真的可以打断与传统的连接吗？张氏看到了“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割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是有一定道理的。今天我们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同样要思考这样的问题。

中国古典史学经历了火的洗礼，在一阵狂风暴雨式批判后，更新原有的形态。在吸收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后，出现新的考据学。近代考据学与中国古典史学中的考据学有联系又有区别。古典史学与近代考据学都追求证实，从方法论上，按梁启超的话来说，“乾嘉诸老”用的是纯粹归纳法。但近代考证学较之古典史学的考据学不同，在吸收乾嘉传统史学考证方法上，又有新的创造。

王国维的考信史学继承乾嘉考据学的成果，特别是运用了乾嘉学者的小学成果来治史，他提出小学对治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学术沟通之林也”^①。在考史上，王氏把训释文字和史事、制度的考察结合起来。他是在民族传统史学的土壤中去进行创造，开辟新的领域，推进前人的研究。清人在音韵文字训诂上获得的认识，在王国维那里成了二重证据法的手段，利用这种手段，把文字材料与地下获得的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同时，王国维对清人考据学者又有批判。他批评清儒大师戴震（东原），说：“东原学问才力，固自横绝一世，然自视过高，鹜名亦甚，其一生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② 王国维的近代考据学是对中国古典考据

^① 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观堂集林》卷五 中华书局，1959年。

^② 王国维：《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观堂集林》卷十二。

史学的批判继承。

刘起釭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中，指出顾先生从清代汉学中所具体承受的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完全熟练掌握了汉学的全貌并深入了解汉学各派的内容，又进而通过清代汉学熟练掌握了汉代学术全貌，再进而熟练掌握了先秦学术全貌。二是兼揽众长地采用清代汉学各派的治学方法。三是善于利用各家研究成果，不仅是正面利用各家提出的结论，还能从各家之说中受到启发，提出新结论。看来似乎不可理解，顾颉刚是疑古，他的治史路径与一味征实以治史的清人汉学大相径庭，但顾先生的治史却正是对古典史学求实、致用的传统的继承。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说：“清代的学风和以前各时代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必要把学问归结于政治的应用，而清代学者则敢于脱离应用的束缚；以前总好规定崇奉一尊，而清代学者为要回复古代的各种学派，无意把一尊的束缚也解除了。”在《古史辨》第四册的《自序》中说：“然而清代学者大都是信古的，他们哪里想到传到现在，会给我们取作疑古之用！”以上是择要说明了中国古典史学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重大作用。

在历史编纂学上，传统史学中的占正宗地位的纪传体史书体裁基本上划上一个句号。本世纪作为纪传体史书一部重大的成果是《清史稿》的编修。这部书也是重在网罗一代典章文献。先后预修者达数百人之多。但是这部书只能是以史稿而结束。也有的学人试着用纪传体形式书史，只能说是凤毛麟角。本世纪补修、改写元史的作品当然没有可能脱离纪传体的框架。

至于对传统纪传体裁赋予新的意义，使它得到新生，那是到本世纪末才出现的事。经过否定之否定后，历史编纂学的遗产是那样值得重视。

百年以来史书占主流地位的是所谓章节体。新出现的所谓的章节体裁，严格地说，不能成为一种体裁，因为章节只是划分段落的办法，既可以用在过去本末体的史书上，也可以用于编年体纪事上，还可以用于学案体一类的学术体史书上。但我们称它为章节体，其积极的意义是它否定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史书编纂形式，它是适应了“民史”观念的一种史书编写形式。它不再是以帝王为中心，以将相臣佐为辅，而下层百姓的活动业绩只能融化在各种《志》、《书》中，因而看不到下层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巨大作用。章节体史书从史学观念上说，是一大进步，是对帝王为中心的历史观念的否定。从编纂形式上，它带有更大的灵活性，能较为方便地反映出社会各个层面的内容。

古典史学中的史法，如春秋笔法、正统史例作为史书编写的原则基本被否定了。史评更多的是关心民族的命运，历史的前途，不是为帝王争正统，更不是“诛乱臣贼子”。

历史观方面如历史循环论、历史倒退论、天意史观，受到了严正的批判。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思想等，与西方的历史进化论结合，又被进化论所代替。在说明历史进程时，到了后来，史家不必要也不会再用公羊经学的观点进行解释。

我们说中国古典史学适应了中世纪社会，它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后，从全局上说，理所当然地要退出历史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史学发展到了本世纪初，就已经终结了。当然，我们也要指出，中国古典史学不应当被当作一盆脏水，全部倒掉。这正像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保存着永恒的学术生命力一样，中国古典史学也是永远保留自己的魅力。如中国史学中的借鉴思想，富有辩证法的历史通变思想，论历史兴衰上的民本思想，史学经世思想，都是我们要十分重视的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中丰富的编纂形式，同样是我们应当利

用的遗产。即使是如纪传体史学体裁形式，在作出一场扬弃之后，可以看出，这种综合形式在反映开阔历史活动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预料，下一个世纪的新史学在各个方面将得到重大的发展，其中也包括中国古典史学的复兴。这样的复兴当然不是回归到古典史学的原点，而是在经过扬弃吸收精华后，来一个大发展，体现出时代特点，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努力吸收古典史学的成果，把中国史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郭沫若说到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指出他没有离开罗振玉、王国维二家的业绩。侯外庐先生在《韧的追求》中说他自己的创造，一个重要方面，是乾嘉学者治学传统与成果对他的影响。但他又不是盲从古人。“我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一向推崇王国维的近代研究方法，而未至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对我的熏陶。”^① 这表明对古典史学吸收，同样要有一个正确的立足点。

到了本世纪八九十年代，白寿彝先生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的四篇《答客问》以及一系列论著，系统地阐发他对史学遗产的见解，论说中国古典史学中优良传统在我们新时期史学建设中的价值。这里包括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以及历史文献学和历史教育学等。他领导当代中国学人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正是他这一思想的落实。除了思想内容外，这部著作采用的新的综合体裁，也是批判吸收中国纪传体史书体裁的长处而形成的。这种新的综合体裁，能充分地反映出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社会各个层面的情况与人物的活动。

本世纪以来，古典史学的命运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这

^①《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91页。

就是民族史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可以得到新生，而生出新的转机；而新时期的历史学也只有充分地吸收民族传统史学的精华，才能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以为只要搬运一些外国学术方法，就能使中国史学出现新的转机，造就中国的新时期的新史学，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所以我们谈论中国古典史学命运，充满了民族自豪与民族自信，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是新世纪史学更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本世纪史学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全盘否定的思潮，回首百年史学我们看到，这种思潮对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损害。20年代，有些人推行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要把线装书统统抛到茅厕里去。但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不久又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大搞考证、琐碎考证，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把中国传统的学术当成“四旧”的内容加以横扫。大批线装书未被抛到茅厕里，而是付之一炬，中国史籍遭到一场浩劫，古典史学的继承被中断。粉碎“四人帮”后，古典史学精华的继承，作为发展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古籍的整理翻印空前繁荣，这为下一个世纪民族史学大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但是我们也不是复古主义者，对古典史学要加以分析。提倡“国粹”、“国学”，我们也加以辨析，其中有的是我们不能苟同的。有些提法，并不是十分准确。以为古典一切皆好，甚至把有些糟粕当作精华赞扬，对史学发展只能起到阻碍的作用。关于“国学”这一提法，似乎也欠妥。即使是提倡“中国本位文化”论的何炳松在1929年也认为，所谓“国学”一词是犯了“名不正”的毛病。不妨再多引用他在文章中的几句话，他说：“‘国学’两个字的意义，我总觉得他广泛模糊，界

限不清，孔老夫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以为国学两个字就犯了‘名不正’的毛病。究竟‘国学’是什么？现在谁能下一个合理的定义？试问国学的声浪闹了这许多年，我们所得的成绩究竟有多少？这不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事例么？”何氏还说了很多“国学”的不是，号召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①正如全盘否定民族传统学术有不同的主张，国粹学中也有不同的意见。20年代“国学”一阵热，三四十年代“国学”热没有以前那样大的声浪。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有一股“国学”热。对此要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里我们不斤斤辨名词，有些名词已成了约定俗成的术语，这里所说的只是对于过去的民族学术，对中国古典史学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中国古典史学不能是全盘地被接受下来，它只能在史学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辩证的扬弃而得到充实、更新、提高。

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中国近代史学这种趋势，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崩溃如果不是从1905年开始的话，至少可以追溯到1919年。”^②但古典史学的终结，绝不是传统史学体系的崩溃，而是作为民族的因子融入新时代的史学。而且，古典史学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都促进新时代史学向前发展，显示史学近代化的特色。

史学遗产包括古代与近代两部分，在进入21世纪时，我们要继承民族史学遗产，这里既包括古代也包括近代的，创造出个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新史学。中国古代文化中，史学是极其灿烂的一部分，在世界上曾占有特殊的地位。新世纪的史学在经过新的发展后，在世界上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所谓“国学”》见《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

②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18页。

第三节 新史学的起与落

我们注意到，20 世纪初年的新史学，到了“五四”前后发生了嬗变，虽然我们也称之为新史学，与 20 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有相同的一面，但是却有着明显区别。20 世纪初年的新史学重在“史界革命”意义的层面上，保持着一股子革命的锐气，对史学理论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出现一批新式的中国通史。20 世纪初年的中国新史学，富有生气。

到了本世纪 20 年代，新史学体现在中国史学全面走上史学近代化道路。在时代大变动的形势下，在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有些人史学思想上的摇摆性表现得更明显，在变化中向后倒退，以至否定自己早年提出的史学理论。梁启超是一个典型。20 年代以后，梁氏的史学已经进入到他的晚期。1920 年，他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中》作《序》，最后写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一书。1922 年至 1925 年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教写的讲义，结集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1922 年至 1927 年先后写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补编》。1929 年梁氏去世。在这期间，他写出的《什么是文化》（1922 年 12 月）及《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3 年 3 月）等，很可以反映他晚年的思想。他对自己在 20 世纪初年提出的新史学思想不但没有发展，而且否定了自己提出的论点，对当年提出的新史学理论进行“忏悔”。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历史有进化的公理公例，到了写《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再提公理公例，认为历史中只有一种因果律，到了他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连因果律也否定了。他说：“历史现象只是‘一越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他说这是在读了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李卡尔